

存在与速度

——维希留与社会批判理论本体论视域的深化

卓承芳 胡大平

摘要 海德格尔是“在”之追问的现代形而上学奠基者，技术—经济所导致的物的虚无性以及“在”之切近性消失乃是其中心问题。维希留基于速度对环境相对性和“在”之位移的历史分析打开了后海德格尔虚无主义批判新思路。在维希留看来，交通和通信技术发展至“实时”阶段，时空被还原为电磁波振动所代表的“时间—光”，“在”之此时此地性被消解，人成为“远程在场”，因此，我们必须提出“在世中”还是“在外世”的问题。在总体上，维希留通过存在与速度关系的追问，深化了社会批判理论的本体论视域。

关键词 存在 速度 社会批判理论 本体论 海德格尔 维希留

作者卓承芳，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江苏南京 210046）；胡大平，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江苏南京 210046）。

中图分类号 B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9)10-0022-09

2018年9月10日，维希留（Paul Virilio）离世，又一根当代思想的支柱悄然复归于尘土中。^①这一事件是否成为他的世纪之新开端，我们不得而知。毕竟，全球化狂躁、虚无主义盛行和世界的沉沦等迫切的事件让人们感到今天仍然是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那些思想巨匠的世纪。更何况，当这样说时，实又是对他们的嘲讽。因为，他们预言这些事件乃是要阻止它们的普遍化。维希留无疑是在这三位德国人的思想路线上行进的，只是作为20世纪60年代崛起的法国思想家，其追问世界和存在的方式和写作风格，与20世纪30—60年代那个阶段浮现出来的巴塔耶、德勒兹等人具有深刻的相似性，而与德国思想的明晰性相去甚远，从而亦给他的思想包裹上一团迷雾。如果他的力量注定要通过穿越那层迷雾才能达到，那么本文的目标便是在中文语境中拨开一道缝隙。用来撬开这个缝隙的锥子乃是海德格尔。在我们看来，衡量维希留的深浅总需要一把尺子，而只有海德格尔这把尺子才能敞开维希留的空间及其意义。因为，究其实质和价值，维希留开启了“后海德格尔”的“在”之追问。在此，“后”（post-）一词具有双重意义：首先是“追随”（after），这意味着维希留的追问乃是与海德格尔有关联的；其次是“反对”（against），意即通过反驳而开启了新的方向或道路。当然，构成我们分析中轴的并非关于世界本质的形而上学定义，而是围绕世界和人的本质这个形而上学问题的追问所敞开的今日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问题。此问题，按照哲学传统的提法，可称为社会批判理论的本体论视域。正是在其上，维希留澄清了作为人之生存环境的世界之相对性及其矛盾，同时阐明了人的超越性及其界限，从而不仅证实了此在的意义，而且为打破在今日此在命

^① 在雷海德看来，维希留的影响力将超过福柯、鲍德里亚等人，必将是21世纪的思想领军人物。Steve Redhead, *The Paul Virilio rea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

运争论过程中的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摇摆提供了一条道路。

一、海德格尔，或维希留社会批判理论本体论视域的参照点

如果有一天技术和经济开发征服了地球上最后一个角落；如果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任何一个事件在任何时间内都会迅即为世人所知；如果人们能够同时“体验”法国国王被刺和东京交响音乐会的情景；如果作为历史的时间已经从所有民族的所有此在那里消失并且仅仅作为迅即性、瞬间性和同时性而在；如果拳击手被奉为民族英雄；如果成千上万人的群众集会成为一种盛典，那么，就像阎王高踞于小鬼之上一样，这个问题仍会凸现出来，即，为了什么？走向哪里？还干什么？^①

关于海德格尔哲学之底蕴与意义已经讨论得太多了。在此，我们无意在细节上重复那些论调，而只是给出作为衡量维希留之尺的海德格尔，即对欧洲在自己开辟的现代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即是世界历史）之中的最终命运的追问。这种追问，甚至从卢梭就已开始，席勒、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等从不同的维度推动着这个哲学事业的深化。海德格尔作为一个制高点，其与众不同之处可谓对“在”这个形而上学问题的追问并由此敞开的哲学（即“思”）视野。撇开复杂的分析，上述引文可以作为其中心问题的自我描述：六个“如果”所挤压的三个关于人类命运的问题。

或许，有人会说，从今天的事态来看，那六个“如果”列表应该延长，毕竟那六个“如果”已经成为“既然如此”^②，而诸如 AI 和宇宙飞船这样的事件亦大大超出了它们映射的范围。如果这是一种需要，我们也可以利用他的弟子约纳斯和汉娜·阿伦特来补充他，他们开启了对这些事件的哲学分析。我们不是在“增补”而是在替代意义上来谈论维希留和海德格尔关系的，尽管维希留本人并没有做出这样的强调。当然，在这样做时，仍然需要强调：海德格尔与之前的马克思和尼采一样，尽管分析有具体的落点，但其关切却是普遍并因此抽象的结构，而在这一方面，他们都达到了本质的层次，正是相同或类似的本质深度才有了在他们之间进行比较的合理性。因此，提出把海德格尔作为维希留的“他者”这个问题，需要做出他与海德格尔相同深度的证明。

旨趣并不需要强调，而深度与海德格尔所称的“六个如果”直接相关。我们先说海德格尔。在海德格尔看来，这“六个如果”代表的人类社会之沉沦的直接原因，大体上可以归结为现代性的五大特征：科学，技术，艺术成为美学，文化的政治化，弃神。^③ 这些原因，在他之前的马克思、尼采、韦伯等人都讨论过，在其科学中，技术问题又处于中心地位。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代表着形而上学之完成亦即其克服，而这是根子上的问题。因为，这意味着，存在这个问题被驱逐了。如果考虑到存在问题即意义问题，那么海德格尔通过其隐晦的表述告诉我们的便是：在现代性之中，最大的问题即是我们不再思考生存的意义。正是这一原因，海德格尔始终追问“在”这个问题，一生都在讲形而上学。^④ 可以说，正是这个原因，海德格尔成为现代性批判的路标，他的思想成为包括法兰克福学派早期、梅洛-庞蒂、福柯等不同批判路径的起点和参照。我们可以将之作为 20 世纪社会批判理论的最重要本体论视域或参照之一，同时这也意味着，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经历 60 年代新社会运动检验而发生转向的批判理论在重新定位自己的本体论视域时^⑤，许多新的派别实际上都是以告别海德格尔为底蕴的。这一点并没有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充分重

①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 38 页。

② 必须肯定的是，尽管在海德格尔做出判断的时候（1935 年），“六个如果”已经非一般端倪，但终究不像今天这样的真切。

③ 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年，第 66—67 页。

④ 从马克思到海德格尔，在关于社会、历史和人的本质假设上，可以说，都体现了一种反本质主义的本质论特征。在其中，传统形而上学的本体论都瓦解了，康德认识论的那种先验哲学也不复有效，但是，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有关对象的形而上学，亦即有关作为对象、作为对一个主体而言的客体的存在者的形而上学”（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年，第 74 页），却始终是我们无法推卸的理论义务，在这一语境中，对形而上学问题的非形而上学追问成为现当代哲学的核心特征之一。在这一意义上，海德格尔乃是反近代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的实现者。

⑤ 从本体论到本体论承诺或本体论视域之说，虽然已经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但仍然需要说明的是，无论说其是承诺还是视域，那种关于何谓“社会”“历史”或“人”的基本假设因其承担着提供确定性根据（即真理性保障）的功能，是任何社会批判理论都不能忽略的。离开这种承诺或视域，我们实际上只会与影像、再现纠缠，就如堂吉珂德与风车。因此，在审理社会批判理论时，揭示其本体论视域亦构成我们对它们进行评判的关键性证据和不可忽略的步骤。

视。我们认为，维希留以晦涩然而有力的方式提供了一个重要例子，故而通过海德格尔参照更能够说清其理论的意义。

那么，一直都讲形而上学的海德格尔何以能够成为现代性批判最重要的本体论视域呢？毕竟，现代性批判，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演示的那样，是以拒斥形而上学为前提的。这就需要简单地阐明海德格尔关于形而上学看法的与众不同之处以及他追问的特征。海德格尔的追问方式是一个相当令人困惑的事情。他通过语言的历时追问把多数专业读者都带到晦暗不明之处，更不必说一般读者了。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其实他在追问时面临一个巨大的困难。这一点在其《形而上学导论》关于“对在的限制”分析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可以肯定地说，他挑出形成、表象、思、应当四个问题来讨论，便是旨在解决意义的流变性和确定性矛盾。实际上，从另一角度来说，历史即是这种矛盾的展开。以存在与思维之间关系这个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为例，突出存在之本体意义的唯物主义指明了意义的根据，但却因此错失了意义本身；与之相反，唯心主义强调了精神的作用，但却把历史置于半空之中。正是由于这类基本问题，才产生了黑格尔基于主客体关系进行调和的需要。我们应当识别隐藏在这一历史中的核心问题：人类驱逐了神而站到了自己历史创造者的位置上，只是他们对这一事实的确定性基础不甚明了。黑格尔—马克思便是试图终结由此展开的哲学争论，他们一致的地方如恩格斯阐明的，在于

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①

当然，以不断生成和消逝的过程作为历史观察的前提时，我们仍然需要确定性保障。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的方案是将历史理解为物质生活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从而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一系列不同层次上的以及不同层次间的矛盾运动（这些运动是客观的）来阐明历史生成的客观动力和机制，尼采将历史理解为强力意志的绽放，弗洛伊德则将之视为无意识的沉淀。他们共同的地方是，都将历史的确定性理解为向自由敞开的事实而非其实现的状态，同时将既往历史理解为异化之历史。在他们之后，海德格尔面对的是相同的事情。他的独特之处在于，通过在与在者之间的区分来观察遗忘之历史，通过历史来揭示“在者之在”。在他看来，“此在”的历史性质确保它是生成过程中的停留，是表象背后相同的“本质”，是追问意义的根据，是尚未实现然终将实现的价值。因此，最终他将自由之路赌在“思”（即对意义的追寻）之上。

无论如何，通过马克思—海德格尔的思想演进，我们看到，现代性社会理解的本体论视域，不再像传统本体论那样，赌在一个停留在那里、总是通过一种形象呈现、现成不变的实体，而是走向了被作为整体的环境所限制的不断生成中的“在”。这一点构成了 20 世纪由卢卡奇掀开的社会批判理论之本体论视域^②，也成为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新激进主义社会批判在前提上更新所欲越过的深层障碍。试图通过考察社会生活之无意识基础的人类学来提供一种新文明框架的结构主义，受其影响从精神分析角度将社会理解为“不可能性”或“裂口”的惊世骇俗的后马克思主义话语（如拉克劳和齐泽克等人），实际上都是把卢卡奇传统的社会批判理论作为自己的靶子，通过更新本体论视域而打开新的批判视野。相对而言，在他们的光环下，维希留被极大地忽视了。然而，他代表着与结构主义不一样的视角：环境相对性和人的存在相对性。这种视角既承接了马克思—海德格尔的历史视域，又为彻底地解决形而上学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行方案，同时亦未像结构主义那样陷入纯粹的认识论优先性的“理论主义”。这便是维希留速度学（dromology）的与众不同之处。

我们将海德格尔作为维希留的直接参照点，除了上述关于“在”的历史视域这个一般原因外，还有两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244 页。

② 值得一提的是，卢卡奇 1923 年发表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实际上与海德格尔是在同一逻辑上展开的。通过这种相似性，我们不难理解海德格尔何以与社会批判理论具有高度的亲缘性。这不仅在于海德格尔的旨趣与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和尼采的文明批判理论高度一致，用他自己的表达方式来讲，乃是对“在场”（现成）的质疑，而且他们对意义的理解也是建立在相似的历史理解基础上的。

个特殊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涉及他们的共同性。技术问题不仅是他们共同的关切中心，而且他们同样地坚持以人类生存之“亲近性”来展开技术批判，也因此对距离问题都很敏感，然而通过距离问题，维希留的追问打开了新的本体论视域深度。本节开头引文中海德格尔谈到的“六个如果”，前四个也都是维希留关注的中心，它们的中轴乃是海德格尔所称的“亲近性”（Near）的丧失。针对这个问题，海德格尔谈到了电子通信的距离辩证法。他强调，时间和空间的一切距离都在缩小，“电视机达到了对一切可能的遥远距离的消除过程的极顶”，“人类在最短的时间内走过了最漫长的路。人类把最大的距离抛在后面，从而以最小的距离把一切都带到自己面前”，然而他提醒人们：“这种对一切距离的匆忙消除并不带来任何切近；因为切近并不在于距离的微小。在路程上离我们最近的东西，通过电影的图像，通过收音机的声响，也可能离我们最远。”^①这里的“远”，既是世界之真实尺度意义上的距离，也是在我们认知（体验）中的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我、人与超越之间的关系，以海德格尔语言来讲，即被我们驱逐了的天空、大地、诸神和终有一死者自身的统一性。

从表面上看，维希留那里不存在人和社会的本体论视域，他只谈论“速度”。不过，如果将速度视为文明的中轴，那将如何呢？维希留说，速度制度统治是这个世界的普遍法则，速度暴力在于灭绝，在其狂潮中，我们不能到达任何地点。因为只有速度本身才是终点。我们不断地出发，不断地自我放逐，消逝于速度的虚空之中。就如旅行，每一次出发都是自我放逐，那么情况将如何呢？他说：

从一个点向另一个点的物理位移在昨天意味着一个出发、一次旅行和一次到达，运输的革命已经在20世纪使这种位移变成对旅行的时限甚至是旅行的本质做的一种逐渐清除，尽管目的地的到达仍然还是一个被位移的时间延续本身所“限制的到达”。^②

如果旅行本身都已经被运输革命取消了，即过程的意义不再，那么“在”将如何呢？更进一步，在速度之光照耀下，广大的环境都被压缩成“当下”（即时在场），我们又如何谈论那种由天地神人统一构成的环境所限制并对其做出反应的“在”？维希留说，“如果在场就是物理意义上的邻近（proximity），那么，互动性远程通信的微观物理的邻近，不久必见证我们的离开，任何人都不存在，就像我们被禁闭在一个被压缩至无的地球物理环境中”^③。同时，在技术视野中，距离即是不断变化的时空关系，它与技术联系在一起并通过速度表现出来，速度本身就成为存在的前提，这就打开了新的本体论视域。

第二个原因涉及维希留的现象学背景。尽管维希留独树一帜，但综观其写作，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在其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他本人承认的。众所周知，梅洛-庞蒂的感知现象学，把“活的经验”（lived experience）提升到现象学第一要素的高度，从而阻止了现象学向唯心论的滑动。维希留的分析与海德格尔有相通之处，但又不同于后者。其根本原因便源自感知现象学。维希留不同于海德格尔的地方在于，当海德格尔拒斥他体验到的现实（战争）而退回到保留着田园诗特征的黑森林时，维希留则试图深入他所体验到的现象之本质，即决定着他体验的东西。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个事实，尽管黑森林是海德格尔的现实，但它却绝非全部现代人的现实。作为在工业文明中残余下来的传统，虽然它是乡愁的具象载体，但因为被驱逐的事实而在实际上是一种抽象的经验。维希留说自己不反对技术，而只是要求掌握技术所打开的新的可能性创造新的文明。在他看来，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我们自身的意识：比别人跑得更快（其速度学的基本含义）。在这一点上，他与海德格尔是一致的；当他不是要求退回过去，而是要求向前把握新文明的可能时，他又不同于海德格尔而是更接近于马克思的乌托邦视域。当然，就其没有提出实质性革命方案而总是重复启示性批判（suggestive critique）而言，他亦面临着自己的问题。只是，这已经不是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问题了。

① 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第172页。

② 保罗·维利里奥：《解放的速度》，陆元昶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页。

③ Paul Virilio, *Open Sky*, London: Verso, 2008, p. 62. 保罗·维利里奥：《解放的速度》，第79页。

二、速度即环境相对性：重新定义“在”之结构及其当代境况

按照维希留本人的说法，他是一名关注距离对于人类生存意义的城市学家，而速度学（Dromology）乃是其原创性的理论贡献。维希留由希腊文词“dromos”（竞赛）词根杜撰出“速度学”，究竟要表达什么意思呢？简单地讲，速度乃是人类生存和文明的基础，人类及其文明正是通过加速而发展或进步的。在维希留看来，速度揭示了人类生存环境的相对性本质，而人类的一切技术都是以速度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在这一意义上，速度学即是考量今日文明状态及其未来的视角。在此，我们的焦点是他的速度学视角给文明叙事带来的本体论视域转向，即从存在向位移的转向。在这种转向中，维希留实现了两个重大哲学观念的突破：其一，借助于“距离”概念，基于环境相对性本质，他将人视为一种界面生存；其二，借助于“速度”概念，基于速度创造的远程客观性，他将人视为一种轨迹。因此，在新的视域中，以电磁波速度进行传输的电信技术支配人类生存时，人类的生存界面就被压缩为零，人亦就成为速度技术的奴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颠覆“重在参与”这个今天的体育竞赛口号来描述这种状态：当强壮的体质不再是我们的目标，竞赛或运动本身便不再是我们的行动，我们的参与只是速度不断实现自己加速的手段。在这一语境中，我们必须提出对存在本身的反思。

（一）距离：环境的相对性与人类的界面生存

受相对论的影响，在维希留看来，环境的根本属性乃是相对性。他的速度学概念便是试图揭示这种相对性的视角。他说：“速度学是相对性本身的核心。速度不是现象，而是现象之间的关系。它就是相对性本身。”^①在物理学上，“速度”这个概念表示时间与空间之间的关系，相对性乃是基本含义之一。除了这一原因之外，维希留之所以用来自希腊文的“dromos”（竞赛）杜撰出“dromology”（速度学）来表明其思考特色，更重要的考虑便是：人类实际上面对的相对性乃是技术的产物，并且呈现着不断加速的趋势。

因此，当他强调这个阳光照耀的世界中一切都献身于速度^②，就将速度作为文明叙事的中轴。从古埃及法老的陪葬礼物中的乘具、战车、航船，到今天的电子通信，都证明速度不只是今天的现象而是贯穿于人类文明始终并构成其基础的问题。在此意义上，他说，每种文明都是建立在特定速度之上的，速度即权力，一切政权都可以视为速度政权。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他认为，在归根结底的意义，工业革命乃是速度革命，其意义在于，从此以后，加速将成为文明的特征。

需要注意的是，在维希留的论述中，他几乎从来都不直接谈论“存在”或人的本质，而是始终紧扣感性的人之现实经验来展开，因此，在他那里没有抽象的人的定义，而只有由实际环境限定的人之生存境遇。正是在这一境遇中，速度对人的存在起着决定性的中介作用，因为，“距离既组织着人与他人的关系，也组织着他与感性经验世界的关系”^③。同时，“如果在场就是物理意义上的邻近（proximity）”，那么，在速度视角中，在场就呈现为不同的样态，例如，由集市、教堂这些空间代表的“直接邻近”（Immediate proximity），由早期人类交通如马匹代表的“代谢性邻近”（metabolic proximity），由机车代表的“机械性邻近”（mechanical proximity），以及电信代表的“电磁性邻近”（electromagnetic proximity）等。在这里，由技术条件决定的相对距离就构成了人的实存。这也意味着，不存在固定不变的人的本质。在这一点上，维希留倒是接近于马克思而离海德格尔较远，后者仍然保留了“在”这个形而上学问题。

在一般意义上，或许有人会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种观念可以理解为环境决定论。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如果考虑到技术本身乃是人类的创造，那么，由技术支撑而由速度代表的环境相对性，仍是主客体的相互作用，这意味着，人的存在本身就是这种作用的产物。只是，在逻辑上，我们不能将人或其存

① Paul Virilio, *Grey Ecology*, New York: Atropos Press, 2009, p. 25.

② 保罗·维利里奥：《战争与电影》，孟晖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1页。

③ Paul Virilio, *Open Sky*, London: Verso, 2008, p. 59.

在等于距离。有趣的是，在《解放的速度》中，维希留通过区分不同的“区间”（interval）似乎不经意地为解决这种逻辑上的难题提供了一种方案。因为，“区间”（interval）与“界面”（interface）是同一回事的两种不同说法。距离从相对角度表现为区间，而从绝对角度来理解则是界面。因此，从客体角度说，它是距离，而从主体角度来说则是人类存在的界面。这样，速度、距离与人通过界面而重叠了。从这一角度，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演变性质就得到了历史解释。维希留说：

如果时间区间（积极符号）和空间区间（消极符号），通过农村（把土地分成小块）和城市（地籍系统的几何设计，安排好了世界的地理和历史，而历法的组织与时间的度量（时钟）也同样主持着对人类社会的巨大的时间政治控制。第三类区间在最近的突然出现，标志着一个质的飞跃，人与环境的关系的一种深刻变化。

在今天，离开光（极限速度）、光速的宇宙常量、绝对的哲学偶然性，时间（绵延）和空间（广延）将是不可理解的。在爱因斯坦之后，它们代替了直到那时被牛顿及其先驱赋予空间和时间的绝对特点。

从这个世纪开始以来，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光速的绝对界限同时照亮了空间和时间。因此，不再是光来照亮各种事物（客体、主体、道路），而是光的极限速度的恒常特性构成理解作为一种现象的世界之绵延和广延的条件。^①

如果过去人类是由时间和空间（它们分别构成人内在和外在的经验）调控的，那么，在今天，维希留说，则是由时空相对性本身调控的。这乃是人类文化的深刻变革。或许，我们可以说，在人的存在分析上，维希留乃是真正站到爱因斯坦相对论高度之上的少数哲学家之一。当然，维希留并非重复了关于世界相对性的常识见解，恰恰相反，他指出这种相对性所透露的现代化之绝对性，即光速构成了我们对世界的体验。他的任务便是提示这种绝对性对人的挑战。因为，在他看来，在20世纪末，“这个星球广大区域不再剩下什么了，它不仅被普遍互动的远程技术所污染，而且被它压缩和还原到零”^②。

（二）加速：存在与位移

至海德格尔为止，人们一直将存在与此时此地（即地方）联系在一起，那种此时此地构成存在的绝对保障。而维希留则指认，不断加速的结果使光速成为时空的绝对性质，甚至他强调，空间由此变成了“时间—光”，即由光速决定的“实时”。在这一语境中，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人的存在性质。在新的视域中，“在”不再与由此时此地编织的“地方”（place）紧紧地绑在一起，而与“位移”（displacement）联系在一起，表现为一个“去地方化”的过程，即存在本身逐步失去了地方（此时此地）的支撑而变成了由实时（real time）通信支配的漂浮中的远程存在（tele-existence）。在这里，维希留把环境的相对性和人（本质）的移动性统一到距离（即时空相关性）上，并直接提出了今日技术条件下的“存在”之言说问题。

（三）实时：远程在场与人类的轨道生存

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因为，“实时”的形成并非只是把人推及“远程在场”境遇，而且它改变了客观的状态。维希留说，众多现象“清晰地预示着客体的终结，在我们面前的东西之终结”^③。在其全部论述中，他提出的“距离污染”问题和灰色生态学视角便是要完整地讲述这个故事。简单地说，这便是在实时通信和交通运输之轨道速度作用下，距离开始销蚀，世界多样性被侵蚀。面对这一新的语境，维希留试图以电磁波轨迹来描述世界以及人之生存。他强调，“将来某一天，主体性和客体性这两个哲学观念会需要波及其即时性摆动的轨迹来补充”^④。他说：

客体、主体，轨道（trajectory）……从今往后，波之轨迹（trajectivity of waves）获得了大众控制的力量，在任何地方都压倒了常识意义的客观性，以及胡塞尔曾经谈到的活生生的现在（living-present）之主体性。当远程客观性（TELEOBJECTIVITY）还没有借助现场直播（LIVE COVERGE）把我们的直接知识驱逐到来世之极端世界，超越可感知现象的地平，对于胡塞尔来说，客观在场仍然与置于他面前的对象有关……那种全

① Paul Virilio, *Open Sky*, London: Verso, 2008, p. 13.

② Paul Virilio, *Open Sky*, London: Verso, 2008, p. 21.

③ Paul Virilio, *The University of Disaster*, Cambridge: Polity, 2010, p. 105.

④ Paul Virilio, *The University of Disaster*, Cambridge: Polity, 2010, p. 107.

球的“直播”突然把所有的电视传送的表象 (representation) 转换为一种过于自明的所谓“完整”世界的呈现 (PRESENTATION)。^①

法文“trajectivite”乃是一个新词,我们基于词根译为“轨道性”,作为权宜之计。维希留以及其他新媒体研究使用这个词来表示主体性与客观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强调其替代了传统的主体性和客观性,成为新处境下的人类生存之本体论前提。人是一种轨道性存在。这不是像传统所称“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的那种“在时间中的持存印记构成人之存在”之意。在这里,轨道实际上是从距离、区间概念演化出来的。维希留强调,上述不同的邻近性,也即不同的轨道性,即由决定速度的不同载体或工具在两个不同位置之间运动(位移)的轨道。如此看来,维希留的“轨道性”这个术语,只是因为电磁波传输特性而使用的,它表达的仍然是人的存在视域。他的意思无非是说,当光速成为我们的宇宙学视野时,我们就进入了一种新的可视性秩序。在其中,“时间视角发生了突变”,“年代学或历史学意义上的流逝时间突然被以电磁波速度曝光的时间所取代”。^②

不过,我们不能低估这种取代的意义。在传统中,事物通过时间的流逝而被我们把握,因此,我们生活在一种“succession”(自然更替)的秩序中;今天,事物通过在我们面前呈现被我们领会,这种呈现是“exposure”(曝光),所以,我们生活在一种技术曝光的秩序中。由此,作为物理学意义上的“邻近”的“在场”,就变成了“曝光”的“远程在场”。存在仍然是一种轨迹,但这还是我们的轨迹吗?

基于界面展开的关于人的生存与速度之间关联的分析,关于存在本身在距离、位移和轨道性层次上的深化,以及最终远程在场对邻近性的替代、即时性曝光对历时性持续的替代,这些概念对“在”之分析的意义何在?它们是否见证了海德格尔的“此在”在信息社会中成为幻觉,远程在场是对此在的删除?

在回答这问题之前,需要先行强调的是,无论是从科学还是生活来说,我们都还没有完全达到这种程度。这也不是维希留的结论。维希留自己说,他的讨论是启示性的。他提出的问题是,如果实时已经成为这个世界展开的主导特点,那么将会发生什么?消除了“Presence”的空间性,而只留下了现时性的时间存在。因此,“present”成为一种消逝的美学,实体存在或实体出现消逝而留下的痕迹。远程在场,作为一个德里达式的危险增补已经出现,它威胁着实体在场的地位。

三、在世中或在外世:关于“在”的今天之问

哲学按其本质只是能是而且必须是一种从思的角度来对赋予尺度和品位的知之渠道和视野的开放。一个民族就是在这种知并从这种知中体会出它在历史的精神世界中的此在并完成其此在。正是这种知识,激励着、迫使着而且追求着一切追问和评价。^③

海德格尔一生都在追问能够打开此在的知识,借此,他在现代哲学历史上树立起一块形而上学里程碑。与海德格尔一致,维希留认为现代性最大的问题之一便是知之尺度和品位的丧失,这是通过其距离污染概念所表达的基本立场。不同的是,在维希留那里,“在”不再具有形而上学的地位,因为它本身即距离构成的界面,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便是位移(displacement),而在速度的作用下,赋予其尺度和品位的时空不断压缩,最终在实时通信的光照下趋于零,存在转化为“远程存在”,被还原为电磁波传输轨道的曝光,并最终趋向于荒漠化。如果维希留所称属实,那么,我们在今天面临的问题是,当“远程在场”删除了海德格尔的“此在”,使之成为信息社会中的幻觉,人类自己如何掌握这个“displacement”?换句话说,如果“在”意味不断地否定自己曾经拥有的地方,不断地跑来跑去,并最终成为一个没有定所的幻影,我们如何抓住它?维希留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与海德格尔一样,他只是提出问题。他们希望在自己的提问中打开新的道路,即思想。既然可能的道路是从质疑我们的处境开始,那我们就来看看这种处境吧。

(一) 从物之虚无到空间的归零

在海德格尔和维希留的关注中,原始世界在技术—科学视野中的消失,始终是中心问题。不同的是,

① Paul Virilio, *The University of Disaster*, Cambridge: Polity, 2010, p. 71.

② Paul Virilio, *The University of Disaster*, Cambridge: Polity, 2010, p. 53.

③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第12页。

前者聚焦于物之物性，而后者更突出世界的真实尺度和维度。

在海德格尔看来，“早在原子弹爆炸之前，科学知识就已经把物之为物消灭掉了。原子弹的爆炸，只不过是早已发生的物之消灭过程的所有粗暴证实中最粗暴的证实：它证实了这样一事情，即物之为物始终是虚无的”^①。而在维希留看来，

作为“世界公民”，作为自然的居民，我们过于经常地忽略了这个事实，即我们也生活在物理尺寸之中，真实尺寸的空间尺度和时间长度之中。构成我们的自然环境的（化学或其他）物质的组成因素的显而易见的退化，与未被觉察的距离污染混杂在一起。……有关运输与传播技术发明……真正地开拓了地球物理环境的尺度和破坏了它的范围。^②

前面我们已经强调，维希留认为，“距离”的污染乃是加速的必然后果。速度乃是虚无主义的力量，世界不仅在其光芒下不断退缩了，而且在最严格的意义上被驱逐出时间。他说，“内爆力量激发老式超音速运载工具（运输工具、投弹器）之渗透力量；而外爆则激发了传统分子炸药的破坏力。在这种悖论目标中，同时内爆和外爆，新的战争机器把双重消失结合在一起：物以原子核分解方式消失以及地方被交通工具摧毁”^③。在 20 世纪末，“这个星球广大区域不再剩下什么了，它不仅被普遍互动的远程技术所污染，而且被它压缩和还原到零”^④。

（二）从地方到“远地”

维希留说：

19 世纪的大众运输的革命，20 世纪的传播的革命，这一场转变和转换同时影响了公共的与家庭的空间，以至于使我们对它们真实性的半信半疑，因为，随着传统电视技术到达远程行动技术（teleaction technologies）这个制高点，初步的实时城市化（urbanization of real time）就替代真实空间的城市化。

从真实空间的基础设施（港口、车站、空港）的建造，到借助互动远程技术学（如心灵传输）对实时环境的控制，这一技术的跃进，在今天创造了新的临界维度。

事实上，有关即时远距离行动的真实瞬间的问题，再一次向我们重新提出了非地（atopia）和乌托邦（utopia）这两个传统观念联系在一起的传统哲学与政治问题，把问题提升到被称远地（teletopia）的东西……^⑤

在维希留看来，今天交通和通信工具的革命，造成了人类历史的飞跃，其最终结果可以用“远地”来描述。在这里，他清晰地指认，在哲学和政治上，“远地”与非地和乌托邦概念相联系，但不是它们的替代形式。那是什么呢？在我们看来，它是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活在别处》之“别处”以及福柯的“异托邦”的颠倒版本。何以是颠倒的呢？“别处”和“异托邦”都是承担了乌托邦功能的具象空间，如福柯提到的墓地、妓院和轮船等。维希留的“远地”乃是实际上支配着现实但却没有具象的空间体验，就如今天的“全球”“因特网世界”“信息社会”等概念，它们是电子通信所建构的空间体现，乃是一种远程客观性（teleobjectivity）。这种远程客观性，取消了人类生活的情境性，破坏了地点观念。他强调，“这就是实时技术正在做的事：它们正在通过将其从此时此地中孤立出来而杀死‘当前’时间，代之以不再与我们在世中‘具体在场’的别处，然而，这是一个我们完全不知的‘谨慎的远程在场’之别处”^⑥。

由此，地理学的地方之战略价值被矢量之非地方化的价值替代了。以单个行动来说，远程行动当然源自某个确定的地点。以网络为例，MAC（Media Access Control 或者 Medium Access Control）地址，或称为物理地址、硬件地址，标识了这个地点的方位。不过，正如电视广播，信号源地址对于政治控制是重要的，但恰恰对于大众行动来说没有意义。更重要的是，在网络环境中，远程行动总是实时互动的，其社会

① 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第 177 页。

② Paul Virilio, *Open Sky*, London: Verso, 2008, p. 59.

③ Paul Virilio, *Speed and Politics*, Los Angeles: Semiotext(e), 2006, p.150.

④ Paul Virilio, *Open Sky*, London: Verso, 2008, p. 21. 保罗·维利里奥：《解放的速度》，第 29 页。

⑤ Paul Virilio, *Open Sky*, London: Verso, 2008, pp. 9-10. 保罗·维利里奥：《解放的速度》，第 14 页。

⑥ Paul Virilio, *Open Sky*, London: Verso, 2008, pp. 10-11.

效果总是由这种互动所维持的，就此来说，地点确实失去了实际意义。所以，远程行动无所谓地点。作为无地点的远程行动之地点，是弥漫式和全能式的。因此，可以将其视为结构本身。正是在此意义上，可用帝国概念来描述。网络信息社会、数字帝国、信息高速公路等用语无不具有相同的性质。维希留也是以这种逻辑来定义它的，只是他采取了城市视角。在他看来，远程行动最终塑造了远程元城市（teletopical metacity）结构，即取消了城市之真实属性而又支配着全部城市发展的那种抽象的结构。这个结构当然是今天所谓城市世界的一种表达方式，只是它更加突出传统民族国家政治结构和交通通信技术限制之消解后的活动框架。

当地点的意义消解，在场也就失去参照，从“出现”（appearance）转化为“消失”（disappearance），最终，“在”本身便成为一个缺乏任何属性的幽灵。维希留问道：“当我们失去了所有的支撑，所有的鼓舞，并因此失去所有的位置参照，我们谈论何种空间性呢？”^①这一发问，不只是针对环境，而且正是直接针对人本身的。因为，“Reference”并非世界本身，而是人的活动界面，并因此是人的活动的界限。人因被周围纠缠并因此纠缠周围而成为人。就此而言，世界总是对人而言的。海德格尔说，“动物没有世界，也没有周围世界的环境”^②，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海德格尔谈论“居”。如果“居”是一种召唤和天地神人的际会，那么，由“居”建构的存在本身便表现为一种空间经验，这种经验是历史性的。然而，在今天，“远地”成为“在”之条件，“远程在场”成为“在”之形式，我们还能够通过“居”于世界而“在”吗？维希留说，当我们失去全部的支撑，就剩余了纯粹的旅程，“在这里最终触及了有关一个不是在世界中而是在世界外存在的哲学问题，然而这个‘在世界之外’的存在却千方百计假装着居住在真实世界之中……”^③

当历史演化到比海德格尔所站更高处，维希留也走到了比海德格尔更深处。就此而言，维希留确实开启了后海德格尔存在之问，存在之问的权杖已经从海德格尔转移到维希留手中。所以，请记住维希留的追问：真实是瞬间性当下吗？填满社会史的是何处现实呢？当前现实的加速难道没有对公开宣称的事实之历史性产生决定性影响吗？更准确地说，真实时间（实时）之历史仍然是历史性的吗？^④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8FZX022）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盛丹艳）

Existence and Speed

—— Virilio and the Deepening of the Ontological Perspective on Social Critical Theory

ZHUO Chengfang, HU Daping

Abstract: Heidegger is the founder of modern metaphysics who inquired about “being”, while the nothingness of things and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nearness of being caused by technology-economy are the central problem. Virilio’s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vity of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displacement of the “being” based on the speed opened up a new thought of post-heidegger nihilism criticism. From Virilio’s point of view,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are moving into the “real time” phase, space-time is reduced to “time-light” represented by electromagnetic wave vibration, “being” of here and now is dissolved, people become “remote presence”, therefore, we must ask whether we are living “in the world” or “out of world”. In general, Virilio asks through the relation between existence and speed, and it deepens the ontological view of social critical theory.

Key words: being, speed, social critical theory, ontology, Heidegger, Virilio

① Paul Virilio, *Open Sky*, London: Verso, 2008, p. 129.

②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第 43 页。

③ Paul Virilio, *Open Sky*, London: Verso, 2008, p. 130.

④ Paul Virilio, *The University of Disaster*, Cambridge: Polity, 2010, p. 1.